

敦煌写本题记的甄别

奚怀永

敦煌写本在正文之外,往往有数段文字记载写本抄写、流传的相关情况,此即所谓的“题记”。我们曾经作过粗略统计,60000多卷敦煌写本中,仅有1200余卷存有题记,比例约为2%^①。虽然数量相对较少,但这些题记大多是由当时人所抄,记载了写本的抄写日期、地点、目的以及抄写人等,是深入研究敦煌写本的宝贵资料,尤其是在写本抄写年代的判定、写本来源情况的考察等方面作用更为直接,效果更为明显。不过,我们在研究中也发现,虽然题记与正文皆出自同一人之手的敦煌写本所占比例较高,但仍然有一部分写本的题记与正文并非出自一人一时之手,其可靠性存在不同程度的疑问,未必反映了写本抄写的真实情况,必须细心甄别。现在按照题写者不同的目的,分三种情况来讨论这一问题。

一、用前代写本背面来书写社会文书上的杂写题记应甄别

敦煌文献纵跨魏晋隋唐宋初,前后近七百年之久。敦煌地区流通的大量写本在失去效用后往往被个人或寺院收藏起来,以备他用。文中经常可以见到在废弃的宗教典籍、官私文书等写卷背后抄写童蒙读物、牒文算历甚至习字涂鸦等。在这些后来抄写的内容中,就自然会夹进后来的日期,故而需要辨识清楚,不能混为一谈。

S.3835 正面抄有《太公家教》、《千字文》和《百鸟名君臣仪仗》三种内

①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藤枝晃已在《敦煌写本概述》文中以英、法、俄、日、中及哥本哈根藏品为统计对象,统计出保留有题记的写本比例为15%。这个比例相对过高。藤枝晃后又在《敦煌遗书之分期》一文中统计,现藏在英、法、俄和原北京图书馆(及旅顺博物馆)的四万卷汉文遗书中,有纪年的近一千卷,则其比例约为2.5%。《敦煌遗书之分期》见于《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敦煌写本概述》原为英文撰写,分两部分发表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欧文纪要《人文》(Zinbun,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istic Studies, Kyoto University)第9-10号上,1966年和1969年出版,后由徐庆全等翻译,发表于《敦煌研究》1996年第2期。

容,字迹相同,笔迹连贯,当是同一人同一时间所抄。卷末有一行题记:“庚寅年十二月日押牙索不子自手记□。”书法与正文相同,当为抄者抄时所题。背面有《马保定卖宅舍契》五行、“辛卯年十月廿八日”一行及其他杂写内容。而卖舍契文中有“于时太平兴国九年甲申岁四月二日”的立契时间,北宋太平兴国九年为公元984年,干支为甲申。翟理斯(Lionel Giles)根据写卷正面抄写一般早于背面的规律,推断正面“庚寅年”为公元930或931年,则背面“辛卯年”为公元931年。敦煌写本正背两面相差几十年时间的情况虽然常见,但一件重要的卖舍契文为何要抄在一件篇幅冗长的学童读物背面?这难免令人生疑。在仔细观察了该写卷图版后,我们发现:正面《千字文》处纸张有破洞,而在背面相应的地方却没有,背面纸张有破痕的地方在正面都是完整的;背面由数张纸拼接而成,拼粘痕迹明显,而《马保定卖宅舍契》五行文字的抄写方向与背面其他文字的方向都是相反的。根据这些特征,我们认为,S.3835应当是由两层纸粘裱而成,即取废弃不用的《马保定卖宅舍契》等数张纸相互拼接、粘补成卷,将空白面作为正面,再抄写《太公家教》等启蒙内容。纸厚耐翻,利于学童读诵。因此,正面的“庚寅年”应当是公元990年,背面的“辛卯年”题记则可能是991年某人的涂鸦。可见,审定正面内容的抄写时间时,我们必须排除背面题记文字的误导。

这一类题记往往是敦煌人率意为之,未必皆有其目的,而且多见于社会文书中,字迹草乱。因此,将各处文字的笔迹相互对照,正是我们甄别的有力方法。

P.3054 正面抄写《开蒙要训》,末尾有“维大唐天福叁年(938)岁次己亥九月五日张富郎书”的题记。而在背面有若干行杂抄类文字,内容芜杂,残缺不全,其中有“维大唐天福叁年岁次己亥五月六日张富郎自□之耳”一行题记和两行诗,字迹与正面《开蒙要训》字迹相同,时间亦合,当是同一人(张富郎)所抄题;又有“癸亥年十月廿□(八?)日”、“维大晋天福伍年□□□□”和“维大晋天福伍年岁次庚子十□月”题记文字各一行,后两种文字字迹相同,但都与正面的文字特点不同,况且还有“大唐”、“大晋”的差别,显然并非张富郎题写。天福三年干支为戊戌,己亥则为天福四年(939),根据古人纪年的习惯,三年很可能是天福四年的误记。据此以推,“癸亥年”应当是公元963年。天福三年与天福五年已有两年之差,与“癸亥年”相差更多。我们可以肯定,卷背的后三处题记文字乃是后来人信手题写,今当避免其干扰。

又如 Ⅱ x 6090 正面残存 21 行文字,所抄为礼忏文,而在背面有“社司转帖右缘”等杂写文字若干,字迹与正面迥然不同,显非同一人所抄。杂写中有“丙戌年七月十日奴子”题记,显然是礼忏文用毕后当时某人(“奴子”?)的涂鸦,“丙戌”具体年代虽不详,但并非礼忏文的抄写时间则无疑。

再如北 0549(菜 083)正面抄写《佛说佛名经卷第一》,背面为杂写若干,其中有“庚寅年五月七日僧王保昌写善恶因果经后写妙法莲华经”字样。此段

题记文字内容与正面佛经显然不合,且与经文书法相异,因此,应当不是正面佛经的抄者抄毕后所题,则“庚寅年”显然不应是正面《佛说佛名经》的抄写时间。

二、蒋孝琬编目的题记应与原卷区别

敦煌文献发现后,西方所谓的“探险家”闻风而至,或骗购或偷盗宝贵文物。斯坦因在以谎话取得了王道士的信任后,即和他的助手蒋孝琬一起挑选经卷。根据斯坦因的记载,他曾经让蒋孝琬编写出经卷的目录:“开始时我曾让蒋师爷对这些经卷列一个粗略的目录,但王道士的勇气与日俱增,他开始一捆捆地往这里送卷子,这使我们打算做一份哪怕是最简略的目录的计划都不得不放弃了,因为经卷实在是太多了。”^①可以看出,斯坦因确实曾让蒋孝琬将陆续见到的敦煌藏经编写出一个目录,后由于经卷数量急剧增加,时间有限,不得不放弃了。虽然蒋氏编写的目录内容并没有记载,但是收藏在英国的敦煌写本中仍然保留着他的题记。如下面的例子:

S.5434 为《金光明最胜王经咒语》抄本,册页装,共 36 页(其中有 2 页空白),部分页上有乌丝界栏,每页或抄 5 行或抄 6 行,行约 13 字,字迹稍劣,笔锋较硬,可能是硬笔抄成,时间约在中晚唐。在此册页的最后一页空白上有三行题记文字:“此书前节是经,后有开蒙要训。后唐清泰二年二月十五日。”原文为竖写格式,“后唐”二字横书。“此书前节是经,后有开蒙要训”之语,即当是对该册页内容的介绍^②。《敦煌遗书总目索引》S.5434 卷号下有说明文字:“残存第四卷至第十卷(永按:实至第九卷)各卷之咒语,卷末题记云:‘此书前节是经,后有开蒙要训,清泰二年(公元 935)二月十五日。’”^③推测其文意,盖是认为“清泰二年二月十五日”是 S.5434 原有题记,亦即其抄写时间。然细审原卷文字,“清泰二年二月十五日”与“此书前节是经,后有开蒙要训”笔迹相同,而与正文大不类。再结合其书写特点,可以断定这三行书于末尾空白页上的题记文字正是蒋氏题写。大概蒋孝琬协助斯坦因以种种方法骗得王道士

①奥雷尔·斯坦因:《发现藏经洞》,姜波、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52 页。

②今日所见 S.5434 下并无《开蒙要训》,遍检英藏写卷,发现 S.5584 正是《开蒙要训》,其装帧形式与 S.5434 相同,开篇有“后唐清泰贰年乙未岁二月十五日,莲台寺比丘愿丞略述写记”的题记(“后唐”二字横书于“清”字上方),首题作“开蒙要训一卷”,正契合蒋孝琬所题“此书前节是经,后有开蒙要训。后唐清泰二年二月十五日”之语(尤其是“蒙”字)。至于规格,根据翟理斯《英伦博物馆汉文敦煌卷子收藏目录》(收入黄永武主编《敦煌丛刊初集》第一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年)的记载,S.5584 和 S.5434 均为暗黄色纸张(Buff paper),规格亦同为 15×11cm。因此,我们认为,S.5434 与 S.5584 原本是一件,蒋氏翻阅后在该件背面(即今 S.5434 最后一页)题写文字,辗转运至英国后不慎脱落为二,而被编作不同号码。

③《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18 页。

拿出敦煌文献后,即翻阅查检,并根据所见内容在文献上作出简单记录,以便编写出斯坦因所说的“粗略的目录”。倘若以“清泰二年二月十五日”作为固有题记而加以定年,则自然谬之又谬。

我们粗略统计,经蒋氏整理归类的经卷足有百餘件,如 S.24《妙法莲华经卷第四》、S.30《维摩诘经卷第一》、S.91《般若波罗蜜多心经》、S.97《金光明最胜王经》、S.98《佛说无量寿宗要经》、S.99《大通方广经》、S.101《佛名经》、S.102《梵网经佛说菩萨心地戒品》、S.103《大般涅槃经》、S.117《佛说阿弥陀经》、S.121《大乘无量寿经》、S.122《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各写卷背面均有蒋孝琬的笔迹,或径抄原卷篇题(如 S.24),或对无题写卷予以简单定名(如 S.101),或描述写卷的残破状态(如 S.122)。蒋孝琬这些字迹的特点完全相同,容易辨别,这为我们利用鉴别字体的方法来准确辨别他题写的题记提供了重要参考。如 S.114《妙法莲华经卷第七》卷末有题记:“上元三年清信士张君彻为亡妹敬写。”而在该卷背面又重抄此卷题目、品数及抄写人题记:

妙法莲华经卷第七□ 自廿五品至廿八品

上元三年张彻为亡妹敬写

原卷经文抄写工整,字风严谨,而此二行题记字迹与之迥乎相异,又加之题于写卷背面,应当是蒋孝琬的题记。再持这些题写文字与上述 S.5434、S.24、S.30 等卷中的蒋氏笔迹相对,正相合,则结论当无误。

三、近现代人为沽利而伪造的题记更应甄汰

藏经洞发现后,一些利欲熏心之人利用人们不熟悉敦煌文献而又想得到敦煌文献的心理,制造伪卷以谋取高利。方广钊先生曾经总结出作伪的两种手段:一种是通卷作伪,一种是伪造题记^①。伪造题记一般是在没有时间题记的敦煌写卷末尾,细心摹仿原卷笔迹,伪造出抄写时间、抄写人等文字。由于这种方法较通卷作伪而言,相对容易,技术水平要求不高,因而作伪者较多。

毫无疑问,近现代人对隋唐时代的敦煌遗书作伪要受到多种方面的限制,因此,方广钊先生认为,对敦煌文献的辨伪可从几个方面加以考察:纸张、界栏、墨色、笔迹、内容、来历^②。我们认为,这些考察因素对于甄别敦煌写卷伪造题记同样适用,其中尤以笔迹与内容(包括与内容相关的文史知识)更为重要。请看以下两例:

甘肃张掖市博物馆藏敦煌写卷张博 001《妙法莲华经卷第三》首尾俱全,内容完整,行间有乌丝界栏,字体基本属于楷体,然笔法较为拙劣,运笔生硬,可能是用硬笔抄写。在原卷尾题与最后一行经文之间夹抄有一行题记:“咸亨元年四月丁酉日弟子千牛田清送。”题记墨色较正文稍浓,点顿之间,笔画饱

①②李伟国等:《敦煌话语》“敦煌遗书的辨伪”,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9-205页。

满,应该是用软笔题写。更重要的是,笔迹与正文大不相同。试比较卷中“千”字的不同用笔习惯:

题记中	正文中	备参(正文中)
千	十 千 十 十 千	十 平 所 币 下

题记中,“千”字末笔乃是悬针竖,正文中,“千”字末一竖画皆笔锋回转,以悬露竖收笔,无一例外。“十”、“下”等字亦同。可再比较“弟”、“子”二字:

题记中	正文中 ^①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两者用笔习惯之不同,无须再加细言。《甘肃藏敦煌文献》第三卷“叙录”言此卷“纸质粗,廉纹宽,不似咸亨年间之物”^②。而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该写卷本身并非赝品,乃是在流出藏经洞后,有好事者臆造题记,局部作伪以谋高利所致。

甘肃西北师范大学藏敦煌写卷西北师大 006《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七十一》,首题尾题皆存,卷帙完整。在该卷品名下有“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译经信息,而卷末有一行题记:“贞观二年史文华写。”字迹与正文迥然不同。《甘肃藏敦煌文献》第三卷“叙录”鉴定云:

此卷尾部的“贞观二年史文华写”题记,显系后人所加。《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只有玄奘译本,而贞观三年(六二九年)玄奘始赴印度取经,贞观十九年(六四五年)返回长安,龙朔三年(六六三年)才译完此经,贞观二年(六二八年)何来《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汉译本?然仔细审视经文和纸,可以肯定写卷本身并非赝品,题记者可能因图高价而妄加此语,结果弄巧成拙,因小利而损坏了文物,良可叹也!^③

可见,西北师大 006 的题记是“无知者为得高价而加上去的”^④,只是缺少了佛学的基本知识^⑤。这正是据内容(包括与内容相关的文史知识)以鉴定题

①此处“弟”、“子”计 12 个字样采集自原卷 6 处,上“弟”字与下“子”字分别一一对应,出自同一处。

②《甘肃藏敦煌文献》第三卷“叙录”部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66 页。

③《甘肃藏敦煌文献》第三卷“叙录”部分,第 361 页。

④详见施萍婷为《甘肃藏敦煌文献》所作“概述”部分。

⑤持西北师大 006 的作伪题记与上图 058《大乘无量寿经》卷尾“贞观五年冬”五字伪造题记相比较,发现二者笔法特点颇为相似,尤以“贞观”二字为甚,故初步怀疑系同一人作伪,后流入不同收藏者之手。

记真伪的典型案列。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学者羽田亨、小川贯式分别在《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讚及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殘卷について》、《西域出土の六朝初期の寫經》两篇论文中提出了写卷题记的真伪性问题^①;60 年代,神田喜一郎《中國書道史上より見たる大谷探險隊の將來品について》一文又对香港某氏所藏《太上玄元道德经》写本“建衡二年庚寅五月五日燉煌郡索統写已”的题记提出怀疑^②。就敦煌文献的来源而论,斯坦因收藏品、伯希和收藏品和国家图书馆第一批收藏品基本不存在赝品^③,俄罗斯收藏写本碎片较多,同时也混杂有黑水城出土写本,而国内各省市地方所藏多来自近代官宦名士,情况复杂,在利用题记进行研究之前,鉴定题记的真伪更是必不可少。

魏晋隋唐时期,正是卷轴形态文献的兴盛阶段,各种典籍多以手抄的形式传承流通。敦煌写本中,既有数人合抄一卷的,也有不同时期的人在同一个写卷上题记杂写的;既有转抄前人经卷而一并誊抄原有题记的,也有伪造题记以谋取高利的。情况比较复杂,时间跨度也较大。因而我们认为,敦煌写本题记的甄别,既包括了题记内容的甄别,也包括了题记本身真伪的鉴定,两者都不可缺。从某种程度上说,鉴定题记的真伪甚至是甄别题记内容、以至利用题记内容的前提条件。题记的甄别工作不容忽视。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

①羽田亨文章原载《东方学》创刊号,1951 年;小川贯式文章原载《佛教史学》6 卷 2 号,1957 年;惜原文皆未得见,此据池田温在 2002 年国际敦煌学学术史研讨会(北京理工大学)上提交的《敦煌写本伪造问题管见》转述。池田氏文章见该次会议论文集(打印本)。

②神田喜一郎文章见《西域文化研究第五·中央アジア佛教美術》,西域文化研究会编,1962 年,第 239-253 页。

③施萍婷在为《甘肃藏敦煌文献》所作的“概述”中提到:“一九九七年六月,设在英国的‘国际敦煌学计划’组织,举办了‘二十世纪初叶的敦煌写本伪卷’小型研讨会。会前、会后都有报道,说大英国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发现了六百件赝品。”真实情况如何,不得而知,倘若为真,则辨伪工作(包括题记辨伪)更显重要。赤尾荣庆《关于伪写本的存在问题》(收入《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年)已经提及中国国家图书馆也藏有伪卷(包括题记),方广锠《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北教 00337 号小考》(《文献》2006 年第 1 期)则已经确认国家图书馆收藏的 BD00337 写卷是伪卷。